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西部地区农民对农村社会的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

谢治菊

(贵州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风险感知是农民对农村社会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农民的风险感知也越来越强烈,而最强烈的是农民对扶贫救灾物资分配、计划生育、经济贫困、老人赡养、农村劳动力转移、拆迁占地补偿风险的感知。在此影响下,农民的政治行为比较保守,参与选举、村级事务决策和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农民的社会行为却处于保守与激进的摇摆状态。逻辑斯蒂回归显示,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是负面的,即风险感知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消极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与之相反,农民风险感知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却不均衡:一方面,农民选择制度性途径规避社会风险的诉求比较强烈;另一方面,他们又更倾向于通过破坏制度的群体性事件来发泄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这些发现对化解农村社会矛盾、降低农村社会风险有积极的帮助。

关键词:风险感知;政治心理;保守;制度化诉求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4-0012-10

德国社会学家 N. Luhmann 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1]。吉登斯也指出,“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核泄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风险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们。”^[2]可见,风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如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风险”成为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人们在忧心风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危害之时,也从多重视角探讨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机制。正是由于当今社会的风险问题越来越多,各级政府已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对基层政府治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在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观念落后的西部农村虽然比较滞后,但随着西部大开发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矿产开发、环境污染等引起的群体性风险事件频频发生,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再加上经济落后的现实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制约,我国西部农村的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了新时期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作

为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之一,农民是如何感知威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农村社会风险及其后果呢?农民的这种感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风险社会下农民的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进行详实的分析。

一、风险感知:研究回顾与研究设计

1. 研究回顾

风险感知一般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Bauer 就提出了风险感知的概念。他认为,消费者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即使消费者能正确估计购买风险,消费者对风险的主观认知(而非风险本身)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起决定作用^[3]。自 Bauer 提出风险感知的概念后,这一概念就受到了国外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人们从多重视角探讨风险感知的概念。如 Paul Slovic 指出:人们应用风险评估来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物时,一般人主要是依赖直觉的风险判

收稿日期:2013-05-06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科规划招标课题(12GZZB208)
作者简介:谢治菊,女,贵州民族学院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理论、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断,即称为风险感知^[4]。Sitkin 和 Pablo 将风险感知定义为决策者评估情境所包含的风险,包括决策者如何描述情境、对风险的可控制性和概率估计以及对估计的信心度^[5]。谢晓菲、徐联仓则认为,风险感知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风险感知有较大的影响^[6]。这意味着,公众的风险感知程度取决于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网络关系。这一点,Douglas and Wildavsky 也有研究。该研究表明,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程度源于社会和文化因素,并受到相关群体如家人、朋友、同事和组织意图等因素的影响^[7]。正是基于此,A. Weiffstein 指出,风险感知已经超越了个体,是反映价值、表征、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8]

虽然学者们对风险感知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相似的,即风险感知是人们对风险特征和风险程度的感受和判断,这种感受和判断具有情景性和动态性,受主观意识的影响较大。诚如贝克所言:“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代,而在于未来。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他决定现在的权力。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而,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9]正是由于风险感知是主观建构的,因此,人们在预防风险时就不再是被动的,而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样,对社会风险的治理就可以进一步的深入到风险产生的主观领域里^[10]。另一方面,对风险感知的测量路径进行了理论探讨,以 Paul Slovic 的心理测量路径和 X. Kasperson 的社会放大路径为代表。Paul Slovic 的心理测量路径是建立在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取决于不同的风险特征这一理论基础上的,通过设计一组量表来测试被试者对各种风险的估计程度。调查发现,风险是会受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个人主观定义的^[11]。X. Kasperson 则认为,社会环境会强化或弱化人们对社会风险的感知,塑造人们的风险行为。反过来,人们的风险行为又会对社会环境和其他群体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由近及远的,会通过不同的群体传递开来,进而对人们的风险感知产生放大效应。这意味着,当人们缺乏风险感知的相关知识时,社会公众对风险的直接经验可能对人们的风险感知产生放大的影响。这时候,专家、媒体和政府对于风险事件的解释就尤为重要^[12]。在理论的指引下,人们将风险感知理论大量应用于食品技术、服务行业、银行业、新产品开发和服装行业等市场营销领域。其中,对食品安全领域

的运用最为广泛。Mitchell 认为,风险感知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13]。

就国内而言,人们对风险感知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在对国外的风险感知理论进行翻译的同时,也尝试将其本土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风险感知(段红霞,2009)、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周应恒、卓佳,2010)、科技风险感知(陈海嵩,2009)、公众风险心理变化(谢晓菲、徐联仓,2002)、风险感知与政府信赖的关系(张岩、魏玖长,2010)、民众风险感知调查(贾建民,2008;刘岩,2011)等方面,研究的方法以实证调查研究为主,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的普通公众。然而,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脆弱性日益加剧,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人们的风险感知越来越强烈。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推动下,城市的许多风险如房地产开发、环境污染、就业风险等逐渐转向了农村。相应的,风险社会的上述特征在农村社会也有大量的映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农村正处在托尼所描述的“就像一个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的水手,只要涌来一股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4]的高风险状态。为此,近几年来,人们更多地关注农村的社会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风险感知问题,对农民风险感知与利益互动、政府信任的关系进行了些许的考察。例如孙蓉、费友海就四川若干地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参保意愿、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态度进行了实证调查,结果发现,农民是否愿意投保,保险公司是否愿意经营农业保险,政府是否愿意扶持农业保险都取决于农业保险制度给相关经济主体所带来的福利以及经济主体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和态度^[15]。然而,虽然目前学界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农民风险感知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的探讨主要限于农业保险、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方面,对农民政治行为、社会行为的影响却鲜有提及。而且,在既有的研究中,虽然不乏实证调查研究,但实证调查的面较窄,仅限于某省的农民群体。调查的方法以问卷为主,基本没有配合深入访谈,这使现有的研究结论略显贫乏和苍白,急需更有说服力的阐释。为此,本文拟在对西部 10 余省 576 位农民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就农民对农村社会的风险感知情况进行叙事,并通过 SPSS18.0 中的逻辑斯蒂回归就农民风险感知与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为风险社会下

我国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贡献绵薄之力。

2. 研究设计与调查

贝克指出,风险本身的严重性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影响着人们对风险的判断,风险本身和风险意识是互为条件、互相加强的,并且因为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9]64}。这提示我们:现代人的风险意识越来越强,这到底是风险本身的程度增加了,还是人们的风险意识增强了,还是二者都增强了?从风险文化的视角来看,风险程度和风险感知都具有主观色彩,是建构性的。正如拉什所言,风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情境下有着不同的话语解

释,不同群体对风险的解读也不一样^[16]。既然风险感知是建构的,那么不同群体的风险感知就不一样。为此,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7 月,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西部 10 余省农村社会风险问题和农民风险感知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①。调查共涉及到贵州、云南、四川、重庆、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共 10 省(自治区或市)^②14 县 24 个乡镇 38 个村庄。调查共回收有效农民问卷 576 份,村干部问卷 215 份,乡镇工作人员问卷 434 份,合计 1225 份。调查问卷的分布情况、调查村庄的具体情况和农民问卷的背景变量分别详见表 1、表 2 和表 3。

表 1 正式调研阶段调查问卷分布情况

序号	调研地点	涉及到的乡镇与村庄	有效问卷数量(份)			
			乡镇工作人员问卷	村干部问卷	农民问卷	合计
1	贵州	9 县 17 个乡镇 30 个村	300	184	422	906
2	四川	1 县 1 个乡镇 1 个村	15	3	10	28
3	重庆	2 县 2 个乡镇 2 个村	45	8	46	99
4	云南	1 县 1 个乡镇 2 个村	19	7	39	65
5	宁夏	1 县 1 个乡镇 1 个村	17	5	14	36
6	甘肃	1 县 1 个乡镇 1 个村	18	3	18	39
7	内蒙古	1 县 1 个乡镇 1 个村	20	5	27	52
合计	7 省	16 县 24 个乡镇 38 个村	434	215	576	1225

表 2 所调查村庄的背景变量(N=38)

背景变量	百分比(%)
村庄人口规模	0~1000 人 17.6
	1001~2000 人 47.1
	2001 人以上 34.8
村庄村民的人均年收入	1500 元以下 39.2
	1501~2500 元 28.1
	2501~4000 元 25.1
	4000 元以上 7.5
村庄文盲人口比重	0 2.5
	1%~10% 54.5
	11%~30% 30.5
	30%~60% 10.0
	60% 以上 2.5
村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0 16.3
	1%~20% 10.5
	21%~50% 12.4
	51%~80% 8.1
	81%~100% 52.6

简言之,我们调查的村庄主要是少数民族村庄,村庄人口规模较小、经济水平低下,农民居住分散、文化素质较低,村庄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项工作进展缓慢。可以说,这些村庄是我国最具典型意义的落后地区,凝集着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种种艰难、体现着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一般共性。因此,对村庄内部农民风险感知和行为选择的探讨具有代表性意义。

表 3 正式调研问卷农民样本的背景变量分析(N=576)

背景变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60.4
	女 39.6
民族	汉族 44.7
	少数民族 55.3
文化程度	文盲 8.4
	小学或初中 70.5
	高中及以上 21.1
家庭收入来源	打工收入 34.2
	农业收入 61.6
	其他收入 4.2
政治面貌	一般群众 75.2
	中共党员 22.6
	民主党派成员 2.2
所在省份	贵州 73.3
	云南 6.8
	内蒙古 4.7
	宁夏、甘肃 5.5
	四川、重庆 9.7
	18~40 岁 34.9
年龄	41~60 岁 53.3
	60 岁以上 11.8

① 调查的目的是完成 2009 年教育部青年项目“风险社会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研究”,该课题已结题。
② 其中,新疆、广西、甘肃是试调研地,正式调研没有涉及到。但试调研在此处获得的访谈记录后面的行文将会涉及到。

二、农民风险感知与农村风险描述： 现实审视与反思

农民的风险感知主要指农民对农村社会中影响社会稳定、引发社会矛盾的各类风险因素的直觉和评价。昂诺娜·欧尼尔指出,如果发达国家是“充满风险的社会”的典范,那么充满风险的社会一定只是根据人们对社会的“感受和态度”而定义的,而不是根据风险的“严重性”和风险对人们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来定义的^[17]。可见,风险感知是社会风险的主要表征,这种表征在我国农村社会明显吗?按照贝克的描述,风险分配像财富一样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9]36}这意味着,经济贫困的地区可能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手头有长期的银行存折、装得满满的钱包、良好的教育和优良的信息捕获能力,他就有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最大的可能性。”^{[9]37}相反的情形是,贫困的、教育水平低下的、信息捕获能力差的人风险规避能力较弱。既然贫困人群的风险规避能力较弱,那么这群人的风险感知程度如何呢?为此,我们首先设计了一道单选题“与过去相比,您如何评价现在农村社会的风险程度?”^①结果显示,有 65% 的农民选择现代农村的风险程度提高了,有 24% 的农民认为现代农村的社会风险程度与过去相比没有变化,还有 11% 的农民认为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经济水平的提升,现代农村的社会风险反而降低了。可见,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认为现代农村的风险因素增加了。至于增加了哪些风险,土地纠纷、民政救济矛盾、养老问题、环境污染等则成为了农民们反映的焦点。为此,我们进行了追问,即列出了农村可能存在的引发社会矛盾的风险因素(详见表 4),每个因素的后面附上“是”与“否”两个答案,让农民对其做出判断。

从表 4 可知,农民们对扶贫救灾物资分配、经济贫困、计划生育、劳动力转移、农村养老和拆迁占地补偿问题的风险感知比较强烈,占 30% 以上,约为三分之一;对村务公开、自然灾害、农村医疗、环境污染、利益表达渠道、村干部贪污腐败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风险感知较弱,百分比从 5.4% 到 22.2% 不等。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风险感知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民生问题,如扶贫、养老、计划生育等风险因素比较关注;二是农民更担心经

表 4 农民对农村社会的风险感知情况统计 (%)

风险因素	是	否
扶贫救灾物资分配问题	52.4	47.6
经济贫困问题	49.5	50.5
计划生育问题	49.4	50.6
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37.5	62.5
农村养老问题	36.5	63.5
拆迁占地补偿问题	30.2	71.8
村务公开问题	22.2	77.8
自然灾害问题	21.7	78.3
农村医疗问题	20.9	79.1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14.2	85.8
利益表达渠道问题	13.7	86.3
村干部贪污腐败问题	13.6	86.4
少数民族传统习俗、 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	8.9	91.1
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	5.3	94.7

济贫困引发的社会风险,对利益表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等问题的风险感知较低;三是农民对经济发达地区反映较多的村干部贪污腐败和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的风险感知明显偏弱。这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风险感知大都与经济效率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有关,与经济发达后的公平、民主、法制等诉求关系微弱。那么,为什么西部地区的农民对与经济效率有关的扶贫救灾物资分配、经济贫困、计划生育、劳动力转移、农村养老和拆迁占地补偿问题的风险感知比较明显呢?因为这些问题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风险,是新时期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障碍。

那么,上述问题会引发哪些风险呢?深入访谈时发现:第一,由于制度、技术和个人的原因,以低保为主的扶贫救灾物资分配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不仅使部分农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赖,还因实施结果不公平,制造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风险。第二,经济贫困引发的社会风险在于:当地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以致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下降,进而引发他们对公共生活的逃离。第三,农村计划生育的执行存在许多问题,如宣传不到位,以罚代生、罚款严重,同样的情况赏罚不一,罚款过程中滥用公权力强拆农民房屋、强牵农民耕牛甚至抓农民坐牢,强制结扎和人流致使干群关系紧张,上级的频繁检查引发

① 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大部分农民都不太能理解风险的意思,因而在调查时我们一律用“灾害、灾难、危险”等相似的词代替风险的概念予以提问。

许多对计生专干的不满和抵触,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考核体系使乡村干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正因为如此,计划生育问题不仅是农民风险感知较高的问题,也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认为最难做、花时间最多的事情,由此引发的暴力对抗、游行静坐示威、越级上访等非制度化参与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公信力和干群关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第四,劳动力转移容易使西部农村形成“空心化”现象,使农村的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环境都面临一定的特殊性,使农村社区面临无人治理的尴尬境地。第五,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式微和新型农村养老制度的不健全使农村老年人无人赡养或赡养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农民上访的热点问题和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直接诱因之一^①。第六,拆迁占地补偿过程中容易诱发新的不公平,致使基层干部贪污,再加上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拆迁占地补偿已成为农民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对抗、静坐游行示威等非制度化参与的主要事由,诱发的群体性事件更是频频发生。第七,村务公开的问题在于公开的形式单一、效果较差,公开的内容不规范,大都流于形式,村务公开制度不健全、随意性较强,对结果公开多,对过程公开少;对常识性问题公开多,对村民最关心的问题公开少;对日常事务公开较多,对关键的政务和财务公开较少。正因为村务公开不到位,村民的民主监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进而离间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降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第八,虽然环境污染不是村民风险感知较高的问题,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深层治理危机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大都处于高山峡谷之间、水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大都是城市的水源地。面对自身的生活垃圾污染和较严重的城市污染转移现象,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却相当薄弱,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虽然本次调查仅发现5例环境污染引发的越级上访、暴力对抗事件,但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涉及面广、人数多、影响大,村民由环境污染引发的非制度化行为往往是有组织有规模的集体行为,这种行为极易转化为大的群体性事件,增加农村维稳成本。

简言之,由于村庄的封闭性强、同质度高,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西部地区农民的风险感知还带有深深的传统烙印,主要关心的还是养老、医疗、经济发展、扶贫等传统农村社区问题引发的社会风险,而与现代性更有关的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利益

表达等风险问题对他们来说还相对陌生,尽管有些农民对他们有一定的风险感知度,但风险感知度较低。而不管是高风险感知问题还是低风险感知问题,其引发的社会风险都在于:致使农民非制度化参与行为增多,离间干群关系,削弱政府认同,损害政府公信力,降低政府信任度,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那么,农民的风险感知是否会对他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呢?下面,我们将通过逻辑斯蒂回归来解析。

三、农民风险感知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农民会选择规避风险吗?

阿兰·斯科特指出,“在风险社会下,人们被迫从传统和安全中漂移出来,然后面临并非像过去一样有支撑规范和预期规定的选择。”^{[16]54}可见,处在风险社会下的人们随时面临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仅是一种环境背景,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常常会做出规避风险或减少风险的行为选择。但是,由于经济水平低下、信息获取能力贫乏,处于贫困状态下的西部农村社会脆弱性更高。相应的,农民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更加缺乏。在此背景下,农民的行为选择理应规避风险。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为此,我们选择了农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作为观察变量,探讨农民的风险感知对他们的影响。为了使分析结果更具可靠性和穿透力,我们使用了SPSS18.0中的逻辑斯蒂回归作为分析工具。为此,就首先要对自变量风险感知进行加工处理,其方法是将答案“是”赋值为1,答案“否”赋值为0,然后,将农民对表4所列的14个指标的选择进行简单平均。接下来,以农民作答的均值0.3748为分界线,将均值低于0.3748的称为低风险感知,将均值高于0.3748的称为高风险感知。最后,将类型化的风险感知转化为虚拟变量,农民的低风险感知赋值为0,农民的高风险感知赋值为1。做完这些处理后,我们将通过逻辑斯蒂回归对农村的风险感知对其行为的影响进行阐释。

1. 风险感知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

在农村,参与投票和选举、关注村庄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参加政治辩论和政治讨论是农民常见

^① 参见谢治菊《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载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的政治行为,也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政治行为。但是,政治辩论和讨论需要参与者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参与技巧,这对西部地区的农民而言要求太高,不太现实。基于此,我们对农民政治行为的调查就锁定在最常见、最集中的农民参与投票、选举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具体题目如表 5 所示。从表 5 可知:第一,对于“您在上次的村干部选举中是否投过票”的问题,有 29.3% 的人表示没有,有 37.2% 的人表示投过票,但是因为乡村干部要求去才去的,仅有 33.5% 的农民表示是自己主动去投票的。可见,风险社会下农民参与选举投票的积极性不高,以被动参与为主。第二,对“您对村委会决策的关注程度如何呢”的调查显示,有 23.6% 的人表示从不关注,44% 的人表示偶尔关注,29.2% 的人表示比较关注,十分关注的人较少,占 3.2%。这反映出农民对村庄公共决策的冷漠。第三,对问题“在大多数情境中,你是通过什么形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而言,有 44.4% 的人表示他们从未参与过村级事务管理,有 55.6% 的人表示他们参与过了,参与的方式有公开投票,占 20.8%,集合农民意见向上级表达,占 20.3%,直接对村干部发表意见,占 14.6%。可见,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上,农民的参与热情也较低。上述三个问题凸显出西部地区农民政治行为的特征:政治参与意识薄弱、能力低下,政治情感迷离,政治表达被

动,政治知识贫乏。那么,农民低迷的政治参与行为与他们的风险感知有关吗?为此,我们要将农民的政治参与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其具体做法是:将没有参与选举的赋值为 0,将被乡村干部要求才去或主动参与村干部选举的赋值为 1;将从不或偶尔关注村委会决策的赋值为 0,将比较或十分关注村委会决策的赋值为 1;将从未参与村级事务的赋值为 0,将通过投票、结合农民意见和直接对村干部发表意见等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赋值为 1(详见表 5)。然后,以农民的风险感知为自变量,分别以农民政治行为中的三种行为方式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得出了表 6 所示的结果。

表 5 农民政治行为倾向统计

政治行为变量		转化为虚拟	
答案		百分比	变量后的赋值
上次的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去参加过?	没有参与	29.3	0
	有,但是因为街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	37.2	1
	有,是自己主动去的	33.5	
您对村委会决策的关注程度如何呢?	从不关注	23.6	0
	偶尔关注	44.0	
	比较关注	29.2	1
	十分关注	3.2	
您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情况是?	从未参与	44.4	0
	公开投票	20.8	
	集合农民的意见	20.3	1
	直接对村干部发表意见	14.6	

表 6 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s 值	显著性水平	Exp (B)	模型概要
模型 1 参与村干部选举投票	风险感知 ^a	-0.736	0.185	15.838	0.000	0.479	P= 0.000, Cox&Snell R ² = 0.029, Nagelkerke R ² =0.040
	常量	-0.372	0.123	9.086	0.003	0.689	
模型 2 对村委会决策的关注	风险感知 ^a	-0.296	0.182	2.639	0.104	0.744	P= 0.104, Cox&Snell R ² = 0.005, Nagelkerke R ² =0.007
	常量	0.820	0.133	37.862	0.000	2.272	
模型 3 对村级事务的参与	风险感知 ^a	-0.296	0.182	2.639	0.000	0.489	P= 0.000, Cox&Snell R ² = 0.031, Nagelkerke R ² =0.041
	常量	0.820	0.133	37.862	0.000	1.811	

注: ^a 参照变量为低风险感知。

如表 6 所示,从 P 值来看,农民的风险感知与农民的选举参与和村级公共事物参与之间具有显著性;从 Nagelkerke R² 值来看,由于变量较少,农民的风险感知对政治参与各个变量的影响都比较微弱。而从 Exp(B) 值来看,高风险感知的农民积极主动参与投票选举的发生比是低风险感知农民的 0.479 倍,即高风险感知的农民更倾向于不参与或被动参与投票选举;高风险感知的农民对村委会决策高关注度的发生比是低风险感知农民的 0.744 倍,即高风险感知的农民“比较关注和十分关注”村委会决策的可能性更小;高风险感知的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发生比是低感知农民的

0.489 倍,即高风险感知的农民更不愿意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可见,风险感知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是负面的,让他们更加被动、冷漠、苍白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向、倾诉自己的政治诉求。这表明,农民的高风险感知会带来更为消极的政治心理,这种消极的政治心理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不仅会离间农民对村庄的公共情怀和情感认同,而且还可能导致农村社区的分崩离析。也就是说,逻辑斯蒂回归的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并没有让农民选择规避风险的积极的政治行为,反而让他们选择了风险本身——消极的政治行为。这个结论使人忧虑,因为消极的政治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村

民自治和乡村凝聚力的瓦解,这种瓦解将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诚如詹姆斯·C.斯科特所言,“那些自治程度最高、内聚力最强的乡村,生存保障最可靠,也最安全。因为如果农民假使可以控制地方事务,他们便选择创立这样的制度——通过对富裕村民提出某些要求,以确保弱者免遭破产和灭顶之灾。”^[18]

2. 风险感知对农民社会行为的影响

社会行为是农民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情感、态度和心理倾向。为了便于统计,我们选择了农民的社会保障行为、社会情感行为和社会纠纷行为作为分析对象,具体的题目见表 7。

表 7 农民社会行为倾向统计 (%)

社会行为变量		转化为虚拟	
答案	百分比	变量后的赋值	
您对参加养老保险的态度是	不愿意	26.4	0
	愿意	73.6	1
您对农民之间矛盾纠纷调解的态度是	找村里的传统权威人物调解	30.1	0
	找熟人调解	32.0	
	找政府部门或村组织调解	17.2	1
	法律途径	19.7	
您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	不参与	25.4	0
	参与化解	18.4	
	参与凑热闹	32.9	1
	参与煽动	23.3	

如表 7 所示:第一,农民养老保险的意愿比较强烈,有 73.6% 的人愿意参加,这一比例是不愿意参加的 2.8 倍。但是实际中,由于担心政策有变,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很低。在我们调查的 38 个村庄中,有 20%、21% ~ 50%、51% ~ 80% 和 81% ~ 100% 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村庄比例分别为 17.4%、9.2%、9.7% 和 20.8%,还有 43% 的村庄没有启动该工作。第二,面对群体性事件时,表示会参与凑热闹的农民比例最高,占 32.9%,这一比例比不参与的农民高 7.5%。表示会参与煽动的农民位居第二,占 23.3%,比参与化解的农民比例高 4.9%。这意味着,农民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比较激进。参与煽动行为的社会破坏力较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参与凑热闹的行为也不可小视,因为虽然参与凑热闹者没有推动群体性事件恶化的主观意愿,但他们会增加群体性事件现场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客观上会使群体性事件朝着更消极的方向发展。第三,农民解决纠纷的途径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途径。其中,非制度化包括找村里的传统权威人物调解和熟人调解,比例分别为 30.1% 和 32%,合计 63.1%;制度化路径包括找政

府部门或村委会调解和走法律途径,比例分别为 17.2% 和 19.7%,合计 36.9%。从单变量来看,农民更愿意通过非制度化途径来解决纠纷和矛盾,这也凸显出西部农村社区还带有明显的熟人社会的特征。熟人社会对农民健康风险的抵御具有较大的帮助,因为它可让农民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使有限的信息在村落内迅速传播,有限信息得到无限利用,以减少社会风险。^[19] 正因为是熟人社会,村里的传统寨里老人和权威人物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贵州 GN 村的村干部说:

“我们村的农民矛盾和纠纷主要是由村干部与村里年龄较大的寨老们一起协调处理,村民一旦有了纠纷,寨老出来说话比较管用,因为作为老一辈人,他们最了解村里山林田地的划分界线历史。”

可见,尽管现代社会已发生较大的变迁,但是寨老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中的协调、商议和处理作用仍不可忽视,在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贡献功不可没,是农民们最信赖的人之一。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风险社会下,农民一方面倾向于通过参加养老保险来规避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农民又感觉无所适从,遇到群体性事件时比较浮躁,对非制度化渠道解决纠纷既维护又不安,因而还是期望矛盾纠纷的解决朝着更加制度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农民在风险社会下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对农村社会的风险感知有一定的关联吗?为此,我们要对表征农民社会行为的变量进行处理,其具体做法是:将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的赋值为 0,将愿意参加的赋值为 1;将不参与或参与化解群体性事件的赋值为 0,将参与凑热闹和煽动的赋值为 1^①;将遇到矛盾纠纷找传统权威或熟人调解的赋值为 0,将通过法律或乡村正式组织调解的赋值为 1。然后以农民的风险感知为自变量,以农民社会行为的 3 个测量指标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从表 8 可知,就 P 值而言,农民的风险感知与反映农民社会心理的三种行为之间均具有一定的显著性;从 Nagelkerke R² 值来看,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比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稍高。而从 Exp(B) 值来看,高风险感知的农民参加农村新型养老保险意愿的发生比是低风险感知农民的

① 之所以给参与凑热闹和参与煽动的赋值相同,是因为这两者都会推动群体性事件恶化,而不参与或参与化解至少不会推动群体性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

表 8 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其社会心理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s 值	显著性水平	Exp (B)	模型概要
您对参与养老 保险的态度是	风险感知 ^a	1. 104	0. 184	36. 175	0. 000	3. 017	P= 0. 000, Cox&Snell R ² = 0. 068, Nagelkerke R ² = 0. 091
	常 量	-0. 384	0. 116	11. 056	0. 001	0. 681	
您对待社会群 体性事件的态度	风险感知 ^a	1. 688	0. 506	11. 142	0. 001	5. 409	P= 0. 000, Cox&Snell R ² = 0. 045, Nagelkerke R ² = 0. 098
	常 量	1. 720	0. 222	60. 202	0. 000	5. 583	
您对个人矛盾 纠纷的调解态度	风险感知 ^a	1. 364	0. 201	45. 898	0. 000	3. 912	P= 0. 003, Cox&Snell R ² = 0. 087, Nagelkerke R ² = 0. 122
	常 量	-1. 592	0. 162	96. 856	0. 000	0. 204	

注:a 参照变量为低风险感知

3.017 倍,即风险感知度越高,农民越愿意参加养老保险来规避风险;高风险感知的农民参与凑热闹或煽动群体性事件的高发生比是低风险感知农民的 5.409 倍,即高风险感知的农民参与煽动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更大;高风险感知的农民通过制度化途径来化解矛盾纠纷的发生比是低风险感知农民的 3.912 倍,即高风险感知的农民更愿意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化解矛盾纠纷。可见,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农民的社会行为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表述为:高风险感知的农民更愿意参加养老保险,更容易参与煽动群体性事件,更愿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农民之间的纠纷。这里得出了看似矛盾的两个结论:面对高风险时,农民选择制度性规避的诉求比较强烈,但同时又更倾向于通过破坏制度的群体性事件来宣泄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即他们一方面渴望制度保护,另一方面又打破制度,为什么呢?詹姆斯·C. 斯科特的观点也许能为我们解惑。斯科特认为,“在安全与收入之间,农民更重视安全。这表明,从收入方面的被剥夺情况出发阐释农民的政治活动可能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那些境况恶化的农民当面临失去以往的大部分安全保障的风险警戒线时,就要进行最剧烈的抵抗。^{[19]50}”而此类风险警戒线之一就是农民失去了生存控制的手段(土地),又即将被迫沦为长期依赖他人的被保护人,以致他们的生存安全将取决于那些有意愿、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单位和个人——政府和亲人。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现代化的发展,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逐渐被剥夺,生存的根基日益被侵蚀,成为了失地农民,因而不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完善的制度化保障。但是,由于财政困难和债务危机,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给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较低。于是,农民和政府的关系就到达了斯科特提出的第二个风险警戒线,即出现在依赖关系中的生存保障崩溃之时,农民就会奋起反抗。这种反抗在斯科特描述的东南亚地区表现为农民革命,在当代中国则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和扩大。

四、结论:风险社会中农民行为
选择之真实图景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化意味着组织和工作中的技术理性和变化的狂潮,除此之外,它包含了更多的东西:社会特征和标准生涯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爱的模式的变化,权势结构的变化,政治压制和参与形式的变化,对现实的看法以及知识模式的变化^{[9]15}。在风险社会下,贝克描述的上述变化都嵌入到了农村社会结构中,这些变化经过社会风险的催化,将产生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冲击现有的农村社会秩序、导致无序参与、加剧农村政治资源整合的困难、引发政治冷漠,等等。这与我们的调查结论不谋而合。调查显示,农民对农村的扶贫救灾物质分配、计划生育、经济贫困、老人赡养、劳动力转移、拆迁占地补偿的风险感知度较高,对村务公开、自然灾害、农村医疗、环境污染、利益表达渠道、村干部贪污腐败、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农村贫富差距问题的风险感知较弱。同时,农民政治行为比较保守,参与选举、村级事务决策和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农民的社会行为比较浮躁。

研究发现,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是负面的,即风险感知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消极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与之相反,农民风险感知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却是不均衡的:一方面,农民选择制度性途径规避社会风险的诉求比较强烈;另一方面,他们又更倾向于通过参与破坏制度的群体性事件来宣泄内心的恐惧、宣泄不安。可见,农民的风险感知对其行为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表现在风险感知促使了农民对制度化规避途径的依赖,这种依赖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和完善政府的规章制度,提升农民的法制意识,净化农村的法制环境。消极的一面表现为风险感知让农

民的内心更加恐惧、害怕和不安,导致政治心理失衡,失衡的政治心理会扭曲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最终引发破坏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群体性事件。正如贝克所指出,“风险不仅是自认和人类健康的次级问题,而且使这些副作用所带来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后果更加严重,如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对工业决策的官僚化审查、新市场的开辟、巨额浪费、法律程序和威信的丧失。总之,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的社会,异常现象往往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9][22]} 尽管贝克诠释的是西方社会一般意义上的风险,但他关于风险社会危害的精辟描述似乎是对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为近几年农村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土地纠纷、计划生育矛盾和扶贫困境找到了学理依据。这一点,詹姆斯·C. 斯科特的表述也比较直白:“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农民生活中生态学依存性的逻辑结论,表明了生存安全比高平均收入更优先。”^[18]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当农民的生命、财产等安全受到威胁时,农民的本能是规避安全为而不是追求更高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政治权利、更强的民主和更丰裕的物质生活。这种选择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西部地区的农民在高风险认知状态下的矛盾选择却颠倒了风险规避的源流关系:规避风险固然重要,但提升风险规避的能力、建立风险规避的长效机制不是更加重要吗?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农民和政府之间的联动机制:一方面,农民要提升自己的风险抵抗能力,包括提升文化素质、经济发展能力、信息捕获能力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增强农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提高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调动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使其政治和社会心理朝着积极、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政治参与、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提供平台,通过发展当地经济、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来减少农民的怨恨和不满,通过强化民主、培育公民社会、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来优化农民的政治心理。也就是说,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多的政治权利、更强的基层民主、更发达的公民社会、更健康的文化环境、更丰裕的物质生活是平衡农民政治和社会行为、抵御农村风险的有效之道。

参考文献:

[1] Luhmann N. *Risk.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M]. Berlin: De

Gruyter, 1993: 218.

- [2] [英] 安东尼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9.
- [3] Dholakia U M. A motivational process model of Product involvement and consumer risk Percep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35 (11/12): 1340-1360.
- [4]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 [J]. *Science*, 1987 (236): 280-285.
- [5] Sitkin S, Pablo A. Reconceptuali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isk Behavior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2 (17): 9-38
- [6] 谢晓菲, 徐联仓. 风险感知研究概况及理论框架 [J]. *心理学动态*, 1995 (2).
- [7] Douglas M, Wildavsky A.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8] Wildavsky A, Dake K. Theories or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 [J]. *Daedalus*, 1990 (4): 41-60.
- [9] [德] 乌尔里希 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 [M]. 吴英姿, 孙淑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5.
- [10] 张云昊.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4): 128-132.
- [11] Slovic P, MacGregor D. Perception of Risk from Automobile Safety Defects [J].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1987 (19): 359-373.
- [12] 谢尔顿 克坦姆斯基, 多米尼克 戈尔丁. 风险社会的社会理论学说 [M]. 徐元玲,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70-178.
- [13] Mitchell, V-W. Consumer Perceived Risk: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odels [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9, 33 (1/2), 163-195.
- [14] [美国] 詹姆斯 C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M]. 程立显, 刘建,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
- [15] 孙蓉, 费友海. 风险感知、利益互动与农业保险制度变迁 [J]. *财贸经济*, 2009 (6).
- [16] [美] 芭芭拉 亚当, 乌尔里希 贝克, 等.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 [M]. 赵延东, 马缨,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69.
- [17] [英] 昂诺娜 欧尼尔. 我们为什么不再信任 [M]. 黄孝如, 译. 台北: 早安财经文化有限公司, 2004: 48.
- [18] [美] 詹姆斯 C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M]. 程立显, 刘建,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52.
- [19] 陈阿江, 程鹏立. 农民是如何化解环境健康风险的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 27-32.

(责任编辑: 李良木)

Peasants’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Choice for Rural Social Risk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s

XIE Zhij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Risk perception is a kind of risk attitude towards and intuitive judgment on the risks of rural society on the part of peasant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rur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peasants’ risk perception, especiall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birth controlling, economic poverty, elderly support,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 or relocation, is becom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Under this influence, peasants’ political behavior tends to be conservative, and the enthusiasm in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village leader ele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n village affairs as well as public affairs tends to be not high. And their social behavior is often in the swinging state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peasants’ risk percep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armers’ political behavior. Namely, the higher a peasant’s risk perception is, the more possibility he has to shut up his inner world, and to inactively or negatively participate or even not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life. On the contrary, the influence on the peasants’ own social behavior by their own’ risk perception is not balanced. On the one hand, the appeal for peasants to choose an institutional way to avoid the social risk is very strong; on the other hand, they prefer to vent their inner fear and anxiety through some mass incidents, which spoil some related social institutions. These findings will positively help to solve rur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Risk Percep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alized Appeal